

金匱腎氣丸之我見

辽宁中医学院医系78级学生 汤忠立

腎氣丸最早見于漢·張仲景《金匱要略》。分別用以治療“腳氣”“虛勞”

“消渴”“痰飲”及“婦人轉胞”等疾患。原方藥物為：干地黄八兩、山茱萸四兩、薯蕷四兩、澤瀉三兩、茯苓三兩、牡丹皮三兩、桂枝一兩、附子（炮）一兩。唐·孫思邈之《備急千金要方》將方中之桂枝改用桂心，並將桂、附之用量加至各二兩。名“八味腎氣丸”；宋·《和劑局方》又將干地黄改用熟地黄名曰“八味丸”。後世亦常按此沿用。一些醫家把此方視為溫補腎陽之方。在方劑分類中把腎氣丸列為補陽劑的代表方劑，並注其功效是“溫補腎陽”。筆者認為此說不甚妥當，究諸仲景先師在《金匱要略》中立方之本義並非專為溫補腎陽而設，而是一首陰陽雙補，重在補益腎氣之劑。下面就此略談幾點粗淺之見。

一、就有关肾气的含义，及其与阴阳之关系来看。

腎是一個很重要的臟器，稱為“先天之本”。腎藏精，腎精是人體的物質基礎。腎精能化氣，腎精所化之氣，稱為腎氣。腎氣是維持人體生長，生殖及水液代謝等各種機能的基本動力。故《素問·上古天真論》說：“女子七歲，腎氣盛，齒更長；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脈通，太沖脈盛，月事以時下，故有子；……七七，任脈虛，太沖脈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壞而無子也。”這突出地反映了腎氣在人體生長，發育和生殖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。而腎精之所以能發揮其作用，也是和腎氣分不開的。以陰陽歸屬之，則腎精屬陰，腎氣屬陽。但腎陰、腎陽又都以腎所藏的精為物質基礎，所以腎的精氣包含

着腎陰與腎陽兩個方面。就腎氣與腎陽的關係來看，我認為則應是腎氣包括腎陽，但腎陽決不是腎氣。例如從臨床上看，腎氣虛證除包含有腎陽虛的一些病證之外，尚有其它病證：如小兒的行遲齒遲，成年人的早衰，不育以及腎不納氣的虛喘，和腎氣不固的滑脫等，均與腎氣的虛衰有着密切的關係，因此在治療上，要着重放在補益腎氣上。

二、就《金匱要略》有关肾气丸的原文主证病机来看，也均属肾气虚。

張仲景在《金匱要略》中有关腎氣丸的主治症共有五個方面，列舉了一些症候。但我認為仔細分析之，却有着共同的病機：

（一）在《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》中用以“治脚气上入，少腹不仁”。此症即是由于腎氣虛衰，陰寒濕冷之邪沿少陰之經上竄少腹而致。正如尤在涇所云：“腎之脈起于足而入于腹，腎氣不治，濕寒之氣隨經上入，聚于少腹，為之不仁，是非驅濕散寒之劑所可治者，須以腎氣丸補腎中之氣，以為生陽化濕之用也。”

（二）《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》曰：“虛勞腰痛，少腹拘急，小便不利者，八味腎氣丸主之。”腰者腎之府，腎臟虛損則真陰真陽皆虛，此時腎氣對內不能濡養，故少腹拘急；對外失去溫煦故腰部疼痛。腎與膀胱為表里，腎氣不足則膀胱氣化無權，故小便不利。清·程林亦認為：“腰者腎之外候，腎虛則腰痛，腎與膀胱為表里，不得三焦之陽氣以決瀉，則小便不利而少腹拘急，州都之官亦失其氣化之職，水中真陽已虧，腎間動氣已

损，是方益肾间之气，气强则便溺行而少腹拘急亦愈矣。”

（三）《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》曰：“夫短气有微饮，当从小便去之，苓桂朮甘汤主之。肾气丸亦主之。”此条肾气丸所主的“短气有微饮”及“小便不利”乃属肾气衰微，津液失于输布，聚而为饮，上留于胸，蔽其肺气而致。正如陈芝亭所释：“若心肺之阳虚则不能行水化气，用苓桂朮甘汤振心阳，崇土以防御之。使天日明而阴霾散，则气化行矣。若肾虚水泛，则吸引无权，当用肾气丸补肾行水，使肾气足则能通府而化气，气化则水道通矣。”

（四）《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》曰：“男子消渴、小便反多，以饮一斗，小便一斗，肾气丸主之。”此言之下消是由于肾气不足，气化无权，不能蒸腾津液上承故口渴善饮，水入而气不及化，肾气虚又不能摄纳水液则小便反多。所以本证治疗应以补益肾气为主。

（五）《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》：“问曰：妇人病饮食如故，烦热不得卧，而反倚息者何也？师曰：此名转胞，不得溺也；以胞系了戾，故致此病，但利小便则愈，宜肾气丸主之。”此病在下焦，而不在于胃，故饮食如故，病在于膀胱的气化无权，小便不通水不下行，浊气反而上逆，故烦热倚息不得卧，这是由于肾气虚而影响胞脬的不利，故名“转胞”。魏念庭认为：“以补肾气为利小便之法，犹之补膀胱气化不足之治，而又耑补在肾气，俾气足而胞正，胞正而系正。小便不利可利矣。”

从上述《金匱要略》的肾气丸主治条文中，不难看到肾气丸的主证，多有肾气不足而不能化水的表现：如小便不利，不得溺、小便反多、短气有微饮等；其主要病机都是肾气虚衰，不能化气行水而致。

三、就肾气丸的组方用药目的来看，是阴阳双补，生发肾气之方。

肾气丸以干地黄滋阴补肾为主药，用量最大。正如缪中醇说：“干地黄，乃补肾家之要药，益阴血之上品。”取其滋补肾阴，益髓填精之用，精足则能化气，辅以山茱萸，酸微温，补肾固精。以增加地黄补肾填精之效。二者合用可收补而不失之功。佐以薯蓣、茯苓健脾益肾，助后天之本，使肾精有化生之源；又佐以泽泻、丹皮泻阴中之火，既可监制方中桂、附之燥烈，又可收补而不滞之功。加入少量的附子、桂枝并非取其峻补肾阳，乃取其：“少火生气”之意。用桂、附以微微生火，温暖水脏，则少火得助，便能充分发挥其蒸精化气之作用，而使肾气渐充。正如柯韵伯所云：“此肾气丸纳桂、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，意不在补火，而在微微生火，即生肾气也。故不曰温肾，而名肾气，斯知肾以气为主，肾得气而土自生也”。因为肾气丸中用少量温热药之目的，是为了蒸精化气，引水上济，所以张仲景选用了具升浮上行之性的附子和桂枝。但是后世一些医家欲使肾气丸补肾阳，竟将上行之桂枝改下行之肉桂，将干地黄改为熟地黄。更有甚者一味增大桂、附之药量，其目的及组方本义已与金匱肾气丸完全不同，可属后世医者加减化裁而另立之方，不可强于张仲景之原义。

结 语

本文分析了肾气丸的组成及功效，并考察了《金匱要略》关于肾气丸主治证的本义，参考了历代医家的论述，认为金匱肾气丸实属一首阴阳双补，重在补益肾气之剂。是张仲景专为调摄肾气而设。把它列为补阳剂的代表方剂是不甚合适的，所以必须还《金匱肾气丸》的本来面目，照张仲景之本义。